

明代杨瞻“乞恩薛瑄从祀孔庙疏”考

□李建

杨瞻(公元1491年~公元1555年),明代宰相杨博之父,山西蒲坂(永济市蒲州镇)人,字叔后,号舜原,明正德十四年举人,授河南扶沟知县,复除授陕西扶风县知县,拜贵州道监察御史,改大理寺评事;不久受命巡按江北,后迁右寺副四川按察司佾事,分巡川北道,驻节保宁,以子博贵,封通议大夫,兵部左侍郎,累赠光禄大夫,柱国少师,兼太子太师,吏部尚书,祀乡贤。

薛瑄(公元1389年~公元1464年),字德温,号敬轩,河东天津(今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)人,明代著名思想家、理学家、文学家,河东学派的创始人,世称“薛河东”,《明史》有传。

薛瑄为永乐十九年(公元1421年)进士,官至通议大夫、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,天顺八年(公元1464年)去世,赠资善大夫、礼部尚书,谥号文清,后世称其为“薛文清”,隆庆五年(公元1571年),从祀孔庙。

薛瑄继曹端之后,在北方开创“河东之学”,蔚为大宗。其学说至明中期,又形成以吕大钧兄弟为主的“关中之学”,其势“几与阳明中分其感”。清人视薛学为朱学传宗,称之为“明初理学之冠”“开明代道学之基”。明政治家、思想家高攀龙认为,有明一代,学脉有二:一是南方的阳明之学,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学,可见其影响之大。其著作集有《薛文清公全集》四十六卷。

(一)

明嘉靖十八年(公元1539年)九月,杨瞻上书朝廷乞恩薛瑄从祀孔庙。其文曰:

臣闻:有一代之兴,必有一代之真儒,以鸣一代之盛。汉有董仲舒,唐有韩愈。至宋,真儒辈出,而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邵雍、张载相继而生,讲明斯道,炯出董、韩之右。而理宗亲收五臣,以从祀孔庙,歿后得谥为理。良以此也,臣伏见前礼部左侍郎赠尚书谥文清薛瑄,反躬好古,真知实践,以诚敬为入门,以复性为实地,所以倡明道学,维持世教者,具载于《读书录》并《续读书录》,二书可考。其在生时,提学山东。诸生称曰:今夫子。通政使李锡称曰:真铁汉。太监金英称曰:好官一人。吏部尚书何文渊称曰:不愧先哲。学士江渊称曰:躬行实践。大学士李贤称曰:本朝理学一人。都御史张鼎称曰:学已至于乐地,观感而兴起者,尤多其在歿后。给事中张九功称曰:今之真儒。工部侍郎姚谟称曰:明体适用,比元大儒当入从祀。参政许赞称曰:潜心理学,可祀庙庭。

吏部尚书乔宇称曰:有功名教,侑食庙庭。无忝仰止,而私淑者尤多。臣参之众论,约之鄙见。我朝真儒,上追先哲,下开来学,惟瑄一人而已。

宋有天下未及三百年,得入祀孔庙



▲《薛文清公全集》木刻版部分



▲薛瑄纪念馆

本版图片 王捷 摄

者,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司马光、邵雍、张载、杨时、胡安国、朱熹、张栻、吕祖谦、蔡沈、真德秀,凡一十三人。

我国家兴道致治,百七十年于兹矣,未有一人从祀者。

恭惟皇上,主敬一之学,演四勿之箴,其心德之妙发,而倡天下之道学至矣。宋之理宗,得此失彼,挂一漏万,其躬收五臣,以从祀者,特一节耳,安能望皇上之大成哉。且瑄理学之臣也,皇上理学之主也,伏望宸断,赐瑄从祀孔庙,使后世知本朝理学之有人,又知表章理学自皇上理学之主始。如蒙乞勅,内阁重臣并詹事府、翰林院、五府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六科十三道,会议查前后诸臣张九功等奏章,果无违碍,特赐俞允,则列圣陶镕天下之士庶乎有征,而我皇上制礼作乐之治亦有光矣。斯文幸甚,斯道幸甚,缘系乞恩,从祀真儒,以光圣治事理。谨题,请奉圣旨,礼部看了来说。

嘉靖十八年九月。

疏文收于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薛文清公行实录》卷二,名曰《从祀真儒以光圣治疏》。

(二)

从祀孔庙,是古代对儒学大家的最高褒奖,是人生的最高荣誉。从祀之人的遴选,相当严格。明代学者瞿九思曾说:“从祀大典,乃乾坤第一大事。”从祀孔庙的先哲先儒,春秋时期多是孔子门人,宋室南迁之后又多为江南俊杰,历史上共有172位,除了孔子门下72弟子和孟子的弟子,剩下的90余人,都是中国古代的世之楷模、思想大家、古圣先贤。

山西是个文化大省,尤其河东大地,更是一块文化热土。然而,宋以前,山西仅有隋末大儒王通、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二人从祀孔庙,而元、明、清漫长的时间里,薛瑄是明代第一个从祀孔庙的人,也是山西历史上从北宋之后到清末唯一从祀孔庙的人。

薛瑄之所以能成为明代从祀孔庙第一人,一方面是因为其为儒学大师,在北方创立了河东学派,弟子众多,影响甚

大;另一方面是薛瑄为官数十年,清正廉明,刚正不阿,享誉民间,被后世誉为“明代第一廉吏”。他甚至还在《从政录》提出了官员廉洁的三重境界“不妄取、不苟取、不敢取”,时至今日仍有警醒作用。

但薛瑄从祀之路颇为漫长。从其卒之次年始,就有人建议其从祀,一直到隆庆五年,其间直请从祀者不下十余奏,献议从祀者亦有十余札。明成化元年(公元1465年),监丞李绅首请薛瑄从祀孔庙,其后请求薛瑄从祀孔庙之人都有:国子监助教李伸、济南府知府陈铨、内阁首辅李贤、南京兵部主事娄性、礼科给事中张九功、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、刑科给事中吴世忠、延绥巡抚姚镛、户科给事中魏时亮、给事中韩楫、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瞻、御史马三乐等。

薛瑄得以在隆庆五年从祀孔庙,一是各方面条件成熟,二是得益于乡党帮忙。《万历野获编》中记载:“薛河东议祀时高新郑(高拱)为政议,言官则吏科都给事韩榘(韩爌之父)为首,山西蒲州人与薛同里,固极意推崇。韩又新郑第一心腹门生,故一疏而穆宗立允,举朝无敢异议。”这段话说明,薛瑄最终得以顺利从祀孔庙,乃是同乡故里帮忙之缘故,众擎易举,这里当然有杨瞻、杨博父子的襄助之力。从中,我们可以知道,从祀孔庙并不仅仅是表达国家对儒家学说的肯定,同时也有着深刻的政治因素。

明隆庆五年九月二十九日,经过朝廷审议,皇帝下诏,薛瑄进入孔庙从祀。朝廷派遣国子监祭酒马自强主持大典,致祭道:“兹者廷臣议奏,故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赠礼部尚书谥文清薛瑄,笃志圣贤,潜心理义。嘉言善行,模范后人。理宜从祀。爰命有司具主,附于前代先儒之后,以昭盛典。特遣祭告,惟神鉴歆。谨告。”从此,薛瑄进入孔庙,享受到每年春秋两季在孔庙祭祀的殊荣。

此时,距薛瑄去世已经107年。有明一代,从祀者只有薛瑄、陈献章、胡居仁、王阳明四人。薛瑄在孔庙的位置在东庑第59位,称“先儒薛子”。

说起来,蒲州杨家与大儒薛瑄渊源

匪浅,早在明天顺六年(公元1462年)正月,杨瞻祖父杨谟,在杨家北院别墅兴建“大椿堂书院”,诚请恩师薛瑄为首席私塾先生,创办“天下第一私塾”,开设文武学堂,培养出众多文武栋梁,文学作品甲于三晋,文状元、大小翰林、进士、举人众多,五世官祖政绩;武状元和武学官职30多人。大椿堂书院也因此载入史册,形成中华老字号品牌。这里尊称薛瑄为“恩师”,由此可见,薛瑄与杨瞻家族私交甚笃。

另,《张四维集》中亦有相关文章:《条麓堂集》卷三,有《薛文清公从祀孔庙记》,作于1571年冬(薛瑄从祀孔庙之年);《条麓堂续集》卷二十四有《祭文清公文》,作于1572年三月二日。

(三)

笔者拙作《明代蒲州作家研究》(三)杨瞻“生平事略”中提到,杨瞻于嘉靖十七年(公元1538年)曾为新修的《宝应县志略》作序,今据搜集的相关史料,简述如次:

嘉靖《宝应县志略》为明代闻人诠、宋佐纂修。闻人诠,浙江余姚人,嘉靖初进士,五年(公元1526年)任宝应知县;宋佐,桂林人,举人,嘉靖十四年(公元1535年)任宝应知县。

嘉靖五年,闻人诠莅官宝应知县后,见宝应史无志书,遂着手延请人员纂修。将脱稿,奉命入朝。宋佐继任。嘉靖十七年巡按杨瞻巡视宝应,宋佐以《志略》手稿奉阅,杨瞻大加赞赏,亲写序文,命“速梓以传”。卷前有杨瞻序、闻人诠序及目录,卷末有义例及宋佐后序等,共四卷。

是书有明嘉靖十七年杨瞻刻本。据考,此本在嘉靖三十六年(公元1557年)倭寇屠城时几乎尽毁,现仅存一部于宁波天一阁。天一阁主浙江鄞县人范钦为嘉靖十一年(公元1532年)进士,官至兵部侍郎,此书即闻人诠所赠。此书另有清抄本。此嘉靖《宝应县志略》(录于《扬州文库·第一辑·第二十四册》),即是据明嘉靖十七年杨瞻刻本影印。